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文学多维度

张 炯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文学多维度

张 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多维度/张炯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ISBN 978 - 7 - 5063 - 4526 - 2

I. 文… II. 张…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335 号

文学多维度

作者: 张 炯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67 千

印张: 17.25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26 - 2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炯

1933年11月生于上海，原籍福建省福安市。1948年10月参加革命，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创作有诗歌、散文和小说等，并参加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和四卷本，任副主编。1960年到1976年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1980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社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员会委员。199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6年改任名誉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此外，还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先后出版个人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等八本，专著《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格局》、《创作思想导向》等八种，并主编《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丛书》十二卷，曾获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提名奖各一次。个人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三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目 录

第一辑 作家评论

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	2
认识鲁迅·····	15
新中国年代的郭沫若与茅盾·····	25
简论巴金与老舍	
——为《新中国文学史》而作·····	39
《丁玲全集》序·····	50
胡风的理论贡献与悲剧·····	63
感念梁斌·····	67
黄春明创作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72
一个有坚定革命理想的作家	
——读《柯岩文集》·····	76
郭澄清创作的成就与特色	
——在郭澄清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82
初评诗人彭燕郊·····	87

第二辑 作品解读

深心警世，情满神州	
——读《胡绳诗存》·····	90





《生死抉择》的巨大历史意义

——评张平的小说与电影《生死抉择》 95

迎向未来的历史回声

——读李瑛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 98

评少年作家张悉妮的新作《假如我是海伦》 103

攀向高峰的艰难

——评世纪之交长篇小说高潮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05

第三辑 历史透视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问题

——答《文艺报》记者问 130

世界格局与中国当代文学 142

开创崭新的文学时代

——纪念新中国文学五十周年 149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思考 160

哲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173

寄希望于现代汉诗 198

第四辑 理论探讨

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未来走向 20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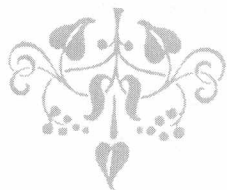
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26

跨世纪的理论命题：文学与现实 241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评论 253

关于文学评论的价值标准问题 259

第一辑 作家评论



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

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他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诗人。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和他的旧体诗词创作，还有他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文学艺术的直接干预，都给予六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他对文艺的干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上著文提倡“平民文学”。1939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总结，提出了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而他首次集中地论述文艺问题的著作则是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并在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了一系列关系文艺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在论述这两个问题时，他实际上辩证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中外文化遗产以及文艺中创作与批评、提高与普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人性与阶级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文艺有关方面的种种规律。

他指出，文艺必须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特别是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作家艺术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思想感情上与人民打成一片，“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歌颂和暴露，无论提高与普及都必须着眼于人民，“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他认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他强调文艺来源于生活，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然后才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他又认为艺术美可以也应该高于生活美，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他主张批判地吸取中外文化遗产中一切好的东西，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和“全盘西化”这种“文学教条主义”；他还主张“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肯定文艺批评是文艺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翼”，认为文艺批评既有政治标准，又有艺术标准，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各有自己的政治与艺术标准。他断言世界观可包括而不能代替艺术的创作方法，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他反对抽象的人性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的人性带有阶级性，而普泛的人类之爱只有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他看来，“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他主张革命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以上引文均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戏曲改革中，他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发挥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思想，认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更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和繁荣科学与文艺的方针。1958年他又总结我国文艺创作的历史经验并根据当时“大跃进”的历史形势提倡文艺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主张，建国前虽已有广泛的影响，但主要限于人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的



崇高威信及其长期所处的领导地位，他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很快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不但被广大文艺工作者所学习和接受，而且被各级文艺管理部门所贯彻执行。因而，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就可以想见。六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改变了我国文艺的社会性质和面貌，由于成为人民的文艺，并贴近现实，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从而新中国文艺便属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广泛地表达人民的心声，突出地塑造了劳动人民的新形象，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负面的影响则是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受到限制而见狭窄，还助长了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至于根据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而作出对文艺过多的不适当的乃至错误的干预，其效果往往造成对于文艺的损害。

作为政治家和党与国家的领导人，由于毛泽东了解和爱好文学艺术，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因而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对文学艺术进行直接的干预。他不仅出席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讲话。1951年5月他对电影《武训传》的放映和评论就作了直接的干预，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这部电影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还被许多共产党员所称赞。他指出，“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虽然武训办学不应完全否定，因为教育贫寒子弟识字，除了传播统治阶级思想，还有传播其他文化的一面。但电影把武训捧为“圣人”，乃至颂为“人民的救星”，确实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的批评，当时全国掀起一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这对于提高作家艺术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有积极的意义。但有些批评已出现“左”的苗头，确也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1954年10月16日他致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当时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又提



出意见。当时青年学人李希凡、蓝翎批评权威学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自传说，认为《红楼梦》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典型概括的现实主义杰作。这本是学术领域的正常争鸣。但因李、蓝的论文曾被《文艺报》退还，后来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此事被毛泽东所注意，他在信中支持李、蓝，严厉批评了《文艺报》，指出“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并认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由此遂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俞平伯，后来又发展到批判胡适的唯心论的运动。《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虽做了自我批评，仍被免职。俞平伯虽未受到处理，但有些批判文章无限上纲，言过其实，不仅对俞在解放后的进步未予应有的肯定，还指责他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目的”。

1955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发展为震动一时的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整肃。胡风本是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艺运动著名的诗人兼理论家。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有关文艺的许多问题上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又有某些不同的看法。以故，革命文艺界在四十年代于重庆和香港曾两次对胡风的一些观点开展批评。1953年在北京周扬又召开会议对他进行第三次批评，后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便是会上的发言整理的。1954年7月胡风写了三十万字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系统地论述自己对发展文艺的意见，并对林、何的批评进行反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公开发表胡风的上述意见书，并开展对他的进一步批判。这本来仍是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后来胡风的一批信件被加“按语”，拟在《文艺报》发表。发表前夕，周扬把清样报送毛泽东。次日，退回的清样中，毛泽东改写了几乎全部的“按语”，并把胡风及



其文艺界的朋友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公安部门介入，抄了胡风及其朋友的家，查出更多带有隐语的来往信件，又分第二、第三批予以加“按语”公布。接着便在全国展开了清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胡风被逮捕判刑，监禁二十多年。他的朋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和迫害。这桩冤案的产生与建国初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固然有关，也与胡风信件中的某些用语易罹怀疑和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有关，从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误。这个事件不仅使文艺界失去一批本应作出积极贡献的力量，也堵塞了与胡风有关的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且在政治上给全国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影响。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全国各界帮助党整风，开展鸣放。入夏，毛泽东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攻击又作出错误的估计，导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文艺界同样受到波及，包括丁玲、艾青、陈企霞、公木等革命老作家和王蒙、刘绍棠、邓友梅、李国文、柳溪等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都先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按敌我矛盾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处理，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也受到公开的批判。由此，毛泽东甚至逐步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即改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重新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这种形势判断便为他后来的“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的根据。此后他不仅发动了所谓“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都波及到文艺界，还在文艺界专门开展了系列的批判，包括对电影《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不夜城》和《舞台姐妹》的批判，还有对新编戏曲《谢瑶环》、《李慧娘》、《海瑞罢官》的批判等。这些批判与他关于文艺界的两个重要批示所表现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对于文艺界所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正是一致的，充分说明了他的“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江青和林彪

^① 见1957年9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等的支持和推波助澜下，他终于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以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标志，表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错误看法全然脱离实际。这份《纪要》由毛泽东亲笔加以修改后公开发表，把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成就几乎完全否定，认为建国以来“文化战线上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而我国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主席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而，“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实际上等于要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果然不久，1966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便正式宣布了这场“革命”，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场对象和方法都完全错误的“革命”历时十年，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文学艺术事业都带来极大的灾难。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到迫害，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十年中有五年几乎没有文学新作。迨至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才感到“没有诗歌和小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人民文学》、《诗刊》等一些文艺刊物方得以恢复，出版社也才可能重新出版文艺作品。但那时的大部分作品仍套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路子来进行构思，没有能够反映生活的真实。可见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和他对于文艺的干预对文学艺术发展影响之大。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他的诗论

在毛泽东一代的革命领袖中喜好中国古典诗词并利用这种旧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的，不止毛泽东一人。像朱德、董必武、周恩来、陈毅等，也都有一定的成就。但最为杰出的当数毛泽东。他不仅有深厚



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早年就爱好诗词，而且他富于诗人的非凡气质和才华。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最新版《毛泽东诗词集》，共收诗词六十七首。其中正编的四十二首都经作者校订定稿；副编的二十五首则情况略不同，有八首是1986年胡乔木所编《毛泽东诗词选》收录的，是当时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其他十七首是新收的，多为不曾公开发表的作品，是编者依据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抄录的，包括作者修改和审定过的，也有作者未再修订的。按这个集子所录，正编中创作最早的是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最晚的是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副编中创作最早的则是1915年的五言古体诗《挽易昌陶》，最晚的是1966年所作七律《有所思》，还有两首咏贾谊的七绝和七律，创作年代不详。

毛泽东诗词的特点是：

第一，他的诗词不仅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大气磅礴的人格和宏博胸襟、崇高情怀，而且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和壮丽图卷。早在1925年创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他就写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时正值大革命时代，诗人见景生情，回忆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正有力地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吞斗牛、改造世界的精神风貌。他的诗词大多是自己革命生涯的真实记录，是自己内心情感的艺术表达。像《菩萨蛮·黄鹤楼》面对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抒发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的苍凉悲慨；像《西江月·井冈山》记述秋收起义后